甘桑石刻文的图像叙事及其文化传统考察

李志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广西平果县甘桑遗址上发现的石刻文字或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骆越文化阶段。对甘桑石刻文的研究表明，其文字表达已具备一定的图像叙事功能，包含着未解的历史文化信息。甘桑石刻文化所属的右江河谷古文明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代码，对石刻文字叙事的解读将对中国古文字史和壮族先民文化史有一定的助益。

关 键 词： 甘桑石刻文　图像叙事　右江河谷古文明

甘桑石刻文，因发现于壮族文化腹地广西平果县甘桑古城而得名。这些文字被刻在一些石片之上，由简单的线条和图案组成，被认为是一种新发现的“表意的古壮侗文”①。甘桑石刻文中有多处类似左江崖壁画中的正身人像，与广西西江流域及其他地域发现的陶文、青铜器铭文亦有相似之处。随着考古与研究工作的推进，该文字被认为来源于古骆越文化。经过考古样本检验，甘桑石刻文所用的石块已有 3000 年左右的历史，但学界对于该文字产生的时间尚存争议，故而阻碍了进一步的探索工作。在使用单纯的考古手段无法解决该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对石刻文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的解读与剖析，并将其置于文化叙事语境下进行整体考察，将有望对甘桑石刻文的民族属性、历史渊源等进行推断。

一

据笔者统计，现已发现的甘桑石刻文约有字符一万个左右，其中平果县博物馆收藏和出土的字符数约有两千个左右，在民间收藏的新旧石器上有字符两千个左右。此外，笔者收藏的石块上有六千多个字符，最大的石块有两千四百多个字符，经过多位专家分析，该块石刻文已经具备长篇叙事的特征。②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水书、彝文等古文字存在相似的字符。水书专家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局周泽亮曾对甘桑三块约三百个石刻文字符号进行了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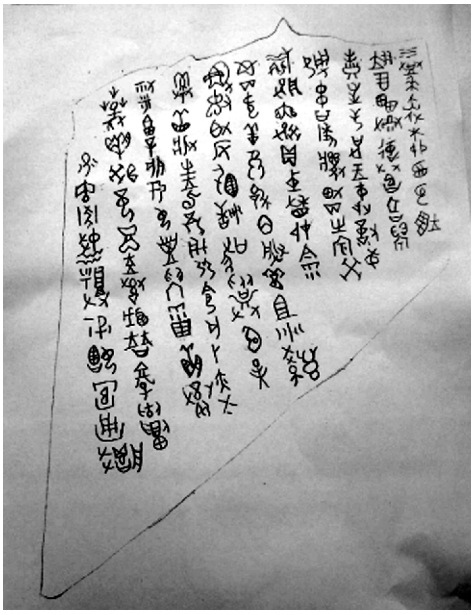
① 参见班召、肖荣钦《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文化遗产》2013 年第 5 期。

② 笔者的收藏大都是甘桑石刻文的发现者潘荣冠的友情赠送，特此表示感谢。

究和释读,认为三块石刻中的文字约有30%与水书文字一致。[①]彝文专家、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覃忠群认为“甘桑石刻文有彝文的影子”[②]。此外,类似甲骨文的“王”字,在笔者收集的每块石刻文中都有出现。虽然有相同之处,但用水书、彝文、甲骨文的拼读规则又无法完全释读甘桑石刻文,需要我们另辟蹊径,进一步研究它的文字构成与叙事内容。

甘桑石刻文字有前后两个阶段的风格差异,前期的石刻文字笔划较少,结构也较简单,后期的文字则与甲骨文更相似,通过偏旁来构建文字。从整体来看,甘桑石刻文已经基本脱离象形字阶段,只有个别的象形字,但还没有发展到形声字阶段,大部分是指事字,有部分属于会意字。这类文字的存在,说明文字的创造者已超越了单纯使用图案来表达某个具体事物的早期创造阶段,而迈向了使用更为复杂的图案与线条组合,来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这使甘桑石刻文的文字图案具有了更突出鲜明的图像叙事特征。

笔者搜集的其中一块石块(图QC003),图片中有字符126个,其中与甲骨文相似或借用偏旁的字符约60个,组成的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其中,是由甲骨文“爪”和“目”组成,是合体字、会意字,手掌放在眼睛上方,可推测其为“瞭望、观看”之意,因南方阳光强烈,隔山相望常用手掌放于眼睛上方遮阳,并有助于集中视线,易于观察。又如,由甲骨文“舟”和“王”组成,可推测其意为“王者之舟”,在壮族先民生活的岭南地区,江河纵横,舟楫为常用的交通工具,在社会已产生阶级分化的情况下,用专有词来记录统治者的专属用品在情理之中。则由甲骨文“田”垒起来,推测其意为“梯田”。岭南壮族先民是传统的稻作族群,他们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也很早就掌握了稻田灌溉的有效方法。这样他们能够在广西的山区中开辟梯田,提高稻米产量,解决温饱问题。左边由甲骨文的上下两个“力”组成,中间上是甲骨文的“火”,下是甲骨文的“言”,右边是甲



(图QC003,平果甘桑石刻文QC003,地表采集,2015年1月2日)

① 《甘桑石刻——水书,象形文字的重大发现》,三都县档案信息网,http://sd.gzdaxx.gov.cn/gzdt/2012-08-27/9946.html,2015-12-09。

②《甘桑石刻文吸引海内目光 百名专家建言献策》,南宁新闻网,http://www.nnnews.net/xwzx/WHYS/BGYS/201301/t20130129_405943.htm,2015-12-11。

骨文的“舟”。虽然目前难以猜测此字的意思,但该文字图像反映的内容与壮族先民的祭祀文化密切相关。舟楫是壮族先民日常的交通工具,“言”或与巫师预言有关,在骆越铜鼓上多见舟楫祭祀之图,船上搭载巫师、士兵、祭祀之物,铜鼓中间的芒星也代表着太阳与火。在壮族的神话中,天底下最先出现的四个火苗,有天火、图额(壮族水神)之火、森林之火以及人类之火,在使用舟楫祭祀的语境下,此字中的“火”则可能与太阳或水中之图额有关。由此可见,甘桑石刻文虽然借用了甲骨文的偏旁符号,但其所表示的意义与甲骨文完全不同。

甘桑石刻文在后期字体上显示出更多甲骨文书写手法的影响,由此推断它的创造者同样处于将文字逐步抽象化的阶段,文字本身具有了更多图像叙事的内容。书写者力图通过一个简单的文字图案,表达一个更抽象、更完整的涵义。文字中对于舟楫、田地、种植的强调,使它呈现出浓厚的壮族先民族群文化——骆越文化的色彩。在目前无法释读甘桑石刻全文的情况下,要阐释它与古骆越文化的关系,还需要考察“图像叙事背后的文化传统”①。

二

平果甘桑石刻文扎根于右江流域,这片土地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传统。借助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和五种叙事的研究范式②,可以进一步解读甘桑石刻文图像叙事背后的文化传统,探索其所保留的早期文化基因。

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平果县,地处右江中游,地理位置特殊,文化现象独特。平果县境内主要世居着壮、汉、瑶三个民族,散居着苗、侗、仫佬、回、彝、水、仡佬、满、蒙古、土家、布依等民族。2014 年,壮族人口仍占全县总人口的 90%左右。平果县属于壮族文字——古壮字的中心区域,盛传用古壮字保存下来的民歌——嘹歌,是西南茶马古道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平果县至今仍保存广西乃至全国最大的土司墓、明代土司州府城堡、石塔及摩崖石刻、崖洞葬等。平果县既保持了浓厚的壮族文化传统,在历史进程中又吸纳了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

1. 右江河谷关于“文字”的口传叙事

甘桑石刻文的出现,凸显了右江河谷壮族地区较为久远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壮族先民借用汉族偏旁部首创造的古壮字,成为当地民歌——嘹歌的文字载体。对文字的重视还体现于当地丰富的造字传说之中。

如关于“三宝造文字传授嘹歌”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在蛇摩山上来了个仙女三宝。她教人们谈诗唱歌,在树皮与石片上写字。一片欢声笑语,惊动了山下的水猴,水猴怒不可遏,想

① 阿尔弗雷德·C.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阿嘎佐诗译,王建民审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6 页。

② 参见叶舒宪《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写”文化的多种叙事》,《百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方设法把人们赶尽杀绝,在危难时刻,三宝挺身而出,打败了水猴,逃难的乡亲们又得以回到家园安居乐业,重新与三宝纵情歌唱。每逢农闲或重大节日,少时几十个,多时上百个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唱歌,动听的歌声引来了岑顺王,他走到三宝传歌的洞口,看见三宝容貌端庄。岑顺王欲占三宝为妾,但碍于人多怕犯众怒,就好言相邀三宝到他的王宫。三宝提出对歌定终身。岑顺王嘶哑的嗓音引来众人大笑,三宝唱歌取笑岑顺王麻脸,岑顺王恼羞成怒,抓起三把黄泥,把三宝堵死在洞内。人们为纪念三宝的功德,在山上修建了一座三宝庙,从此这里成为一个歌圩与朝拜三宝的地方。[①]从民间神话传说和《壮族麽经布洛陀》的描述来看,右江河谷一带存在着先进的部落文明,被称为鸟部落,布洛陀是部落的首领。布洛陀这位神祇具有氏族酋长性质的身分——他是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壮族先民部落联盟的领袖。一方面,他兼有祭司的职能,已成为麽教信仰中的主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是行政首领、军事首领。在他身上,体现了本氏族部落的兴衰过程。在《壮族麽经布洛陀》的"造文字历书"中这样解释文字起源:"古时候没有书,人们做什么都是盲目的;到后来,吃禾苗的蝗虫和螟虫在纸上爬来爬去,爬成了文字,并成为皇书和官书。从此土官皇帝照书治理。"[②]这是古骆越民族对文字起源生动形象的解释,但比三宝造字的传说显然晚了许多。

造字口传叙事记载了古骆越民族对天地万物起源的认识,记录了古骆越民族古老的历史文化,同时活态化地传承着古骆越民族的民俗、农事、教化等方面的内容。

2. 右江流域的书写传统

通过上述有关造字的口传叙事可以看出,壮族先民所采用的早期文字以刻划文为主。接受汉族文化之后,则以古壮字书写为主。至今,在右江流域,仍保持了古壮字的书写传统。右江流域流传的布洛陀经诗,全部使用古壮字书写。

平果县的师公、道公也保留有大量的古壮字经书,每年应约举办各种道场仪式。这些仪式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不同的道场喃唱不同的经书,光是一个丧场的经书就有十多本,要喃唱三天三夜。在丧葬仪式上,道公所颂的经文为传承手抄本,又称"金书"。如平果凤梧镇韦锦利师公的经书包括这样几类:(1)丧葬用书,这些经书主要唱述各个神的故事;(2)打斋用书,这类经书主要是祭祀、驱鬼治病;(3)受戒用书,各类经书不下百本。

平果县还是嘹歌的重要传承地区,嘹歌文本使用古壮字(土俗字)传抄,主要反映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嘹歌传承着古壮族的文化密码,特别是古壮字中有上百个偏旁符号不是来自汉字的偏旁,应与古骆越文化传统有关。如"米"字旁,在《古壮

① 2013年7月14日笔者访谈都阳三板屯都阳土司黄流的后代黄宪群时记录。

②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页。

字字典》中，含“米”意义的就有 15 个词条，如“米兵”“米林”“米只”等，既有动词也有名词，名词中有米的种类、用米做成的食品、量米淘米的器具等。这些词表现了南方壮族主食大米的习俗。

3. 甘桑石刻文与古骆越文化传统

平果县所属的右江流域，在商周时代被认为是骆越方国的管辖范围。骆越方国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创造了璀璨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歌圩文化、坡芽歌书文化、女子太阳节文化等等。在与平果县毗邻的大明山武鸣县马头镇，曾发现近千座商周时期的古墓群。经郑超雄等壮族考古专家论证，认为武鸣县马头镇就是古骆越方国的都城。[①]在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文字符号，与周边的县城隆安、田东、龙州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字符号相同，都被认定是古骆越文字，与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文化同期。[②]

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又在贵港、合浦、龙州、南宁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文字石、文字陶片、文字玉片等古骆越文字载体，并整理了二千多个古骆越文字，取得了新的突破。[③]2010 年秋，在龙州县的左江上游金河段发现了一把石戈，石戈上刻有字迹清晰的 6 个字，经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谢寿球确认为古骆越文字。该石戈的形状与甘桑新发现的数个石锛（民间收藏）很相似，为打磨精美的石铲形，中间刻有整齐排列的字符。此外，在左江上游金河段也打捞出来了古骆越卜辞石戈。在新石器时代，左江流域是壮族先民古骆越人活动的主要地域，石戈上的文字很明显是古骆越人的文字。据李锦芳研究团队近年的调查研究，在隆安还发现了骆越文卜辞骨片约上百件，在梧州发现有陶刻文的陶罐，在西江流域一带也打捞出许多古文字的陶片；这些文字有不少与甲骨文相同，所写的内容据推断包括卜辞、祭祀求雨等。类似于这样的刻划文字在骆越文化的故地和旧址多有发现。这些地方的文字文物虽与甘桑文材质不太一样，但是字符的构造和形状都十分相似，至少可以证明在骆越古地出现的甘桑石刻文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也可以明确这类刻划文并不是外来族群带入的遗存，它有自己明显的标志性特征。甘桑石刻文的出现，也应是骆越方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文化背景的产物。

在甘桑石刻文上，还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鼓上的太阳纹图案。铜鼓是壮族先民的宗教祭祀礼器，备受重视。直至隋朝，《隋书·地理志》还说壮族先民“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诸僚铸铜为大鼓”，其“俗好相攻，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

① 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09 页。

② 刘建安：《考古新发现：骆越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中国民族》2012 年第 1 期。

③《骆越古文字研究又取得新成果》，载骆越文化网，http://www.luoyue.org/show.aspx?tid=b3d79ea7-4de7-416a-ae14-cff70e4a4718，2015-12-01。

为‘都老’,群情推服。”[①]此外,此符号还出现在云南文山岩画和坡芽歌书之中。因此,此符号出现在甘桑石刻文中绝不能视其为偶然现象,而应是同一文化传统使然。

在平果县的东南方,有宁明花山岩画。这些壁画线条粗犷,造型古朴,历经数千年风雨侵蚀,依然清晰可见。据专家考证,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早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经秦汉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完善,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②]壁画的许多符号,如太阳图案、蛙人舞蹈图案,在甘桑石刻文中也有出现。

在富宁县坡芽村还发现了“坡芽歌书”,周有光称之为“文字之芽”,它亦被视为古骆越文化的遗存。但从坡芽歌书的表意属性看,它与甘桑石刻文属于不同的文字系统,甘桑石刻文的表意属性更复杂多样。

4. 甘桑石刻文与古骆越祭祀活动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广西西南部地区考古发现了许多大石铲,尤其左江、右江交汇地带及其下游一带是大石铲遗存分布的中心地区。许多遗址的石铲在出土时呈直立状,多数刃部朝天,柄部朝下;有的则几件或十多件竖立排列成行,或竖立围成圆圈,或侧立围成椭圆形,如武鸣县太平乡葛阳村附近的塘灾岭发现的一组共22件石铲,排成一个椭圆圈,内底有一层灰烬和红烧土;隆安县大龙潭遗址亦发现两组侧立或直立成圆圈的大石铲,圈内底有一层红烧土和灰烬。[③]上述的石铲排列形式,应是人为有意置放的结果,很可能是当时人们使用石铲来举行某种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仪式。将特制的大石铲作为祭祀的礼器,组合成各种形式并配合相应的仪式祭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至今,在大石铲上尚未发现古文字符号,而在小石铲上发现了甘桑石刻文,其所记载的内容或许与用大石铲祭祀有关。无论如何,在古骆越文化区域内,甘桑石刻文作为单独选择石头作为书写材料的文字记录,与大石铲文化和祭祀应有一定联系。

总之,通过分析甘桑石刻文图像背后的文化叙事,可以看出它具有古骆越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与在古骆越地区遗留的花山岩画、刻画符号、祭祀活动有诸多联系。甘桑石刻文图像背后的文化叙事,展示了骆越文化独特的文化基因代码。

三

通过对甘桑石刻文进行深入的图像分析及其文化传统考察,能够发现,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起源于先秦的古文字,具有丰富的表意功能,有基本成熟的象形、指事等造字方法,文字产

① 魏收撰《魏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 蒋廷瑜:《左江“花山岩画”奇观》,《大众考古》2015年第7期。

③ 覃义生、覃彩銮:《大石铲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生年代与甲骨文基本并行,从其中一些石块上仍可以读出少量的类似甲骨文的文字符号。刻划的年代约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因为文字最初是刻在随处可得的石片上,到后来逐渐刻在磨制得非常规则的精美石铲和石锛等石器上,另外推测刻划文字的部落中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族群,他们逐渐融入到古骆越族群之中。甘桑石刻文可能是古骆越族群共同的母语文字。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平果甘桑遗址或许是骆越方国最早的祭祀、文献保存中心,花山岩画是该方国的祭祀欢庆艺术中心。骆越方国的始祖是鸟部落的布洛陀和姆勒甲。活态化的西畴古歌是骆越方国保存的最古老的口传文学,用古壮字记录的《麽经布洛陀》和嘹歌则是活态化的书面文学。麽公和师公传唱的经文是古骆越祭祀文化的活态呈现。古骆越民族的文化传播路线主要是往云南方向,右江流域的广西百色和云南文山为古骆越文化的主要积存地。

据明代《白山司志》中记载"甘桑城在丹良七塘山后,有瀑布穿城而下,相传亦岑瑛所筑,其修筑年月不可考,仅存基址"①。可见甘桑遗址与当地土司岑氏家族有密切关系。至今发现的刻有上万个字符的甘桑石刻文石片,或为岑氏一族的先祖所保有的先秦祭祀用具,记载的内容与古骆越族群的图腾崇拜、祭祀、族群迁徙、部落战争、狩猎、耕作、欢庆、求偶等等相关,这些内容因有人专职掌管,不可能如情歌那样为大众口头流传,只能由主管祭祀的巫师所吟诵,记载在石刻、经文之中。岑氏先祖或许就是骆越古文字的创造者与保存者。

(李志强,百色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白山司志》卷之二"建置",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